

西方哲理译丛

NO.8

A c a d e m i c  
N o b i l i t y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S t a t u s

# 学术贵族与政治饭碗

〔德〕马克斯·韦伯——著 刘富胜 李君华——译

Max Weber



在科学领域

对任务的献身精神

会让科学家感到他所从事的

主题的崇高和尊贵

这与艺术家

没有区别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西方哲理译丛 ●

Max Weber

〔德〕 马克斯·韦伯——著  
刘富胜 李君华——译

# 学术贵族与政治饭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贵族与政治饭碗 / (德)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著; 刘富胜, 李君华译. —北京: 金城  
出版社, 2019. 3

书名原文: Academic Nobility and Political  
Status

ISBN 978 - 7 - 5155 - 1678 - 3

I. ①学… II. ①马… ②刘… ③李… III. ①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0273 号

学术贵族与政治饭碗

---

著 者 [德] 马克斯·韦伯

译 者 刘富胜 李君华

责任编辑 李凯丽

开 本 66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5 - 1678 - 3

定 价 32.0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 译 序

中国古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近有“仕而优则学”的风尚，无论从学者到官员，还是从官员到学者，都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学问精深而又仕途通达之人，不过大多数人往往因为学术而误了仕途，或者因为仕途而远离了学术。看来学术与政治就如同“鱼与熊掌”，很难兼得。当然，从事学术与从事政治并不是好与坏之别，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是做一个学术贵族，还是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政治饭碗？相信有兴趣翻阅此书的朋友，也正在这种困境中，希冀于韦伯给出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韦伯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市，1882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1889年在柏林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柏林任见习律师，后进入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1903年与W·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F·滕尼斯、G·齐美尔等人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1919年曾参与魏玛宪法制定工作。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译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政治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科学论文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广泛，学术研究视野宽阔，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是继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德国又一位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的思想家。

本书编译了韦伯的三篇论文《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都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稿。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向青年学子讲述了学术环境、学者命运、学问之道等问题。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则阐述了政治合法性、现代政治家的起源、政治家类型与素养、政治与伦理等问题。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政治活动，都面临“为何”的问题，这是“祛魅”之后留给个人的困惑。而在发表这两次演讲之前，韦伯在《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对生于其中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在该文中韦伯以“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非东方”这个问题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精神特质及其根源进行了追问。

本书选译的三篇论文先前都有中译本。《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有黄晓京、彭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陈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中译本有冯克利译的《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钱永祥等译的《韦伯作品集·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先前的中译本是我们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工具，也对本次翻译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向他们表达译者的敬意。

本书的编译工作由电子科技大学的刘富胜和民航飞行学院的李君华共同完成，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凡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 目 录

以学术为业 / 1

以政治为业 / 31

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 / 87

第一章 宗教团体与社会阶层 / 88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 96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 118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 127

（一）加尔文派 / 129

（二）虔信派 / 149

（三）循道派 / 156

（四）浸礼宗诸派 / 159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 167

# 以学术为业

---

你们希望我谈一谈“以学术为业”这个话题。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习惯于从外在环境开始，那我也从这里谈起。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就这个词的现实感而言，以学术为业的环境是什么？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和本质上都意味着：一个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科学，决定在大学度过自己一生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前景是什么？为了理解德国环境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先对照认识一下国外的环境。在这方面，美国与德国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将着重谈美国的情况。

众所周知，德国年轻人从事科学职业都是从私人讲师的职位开始的，在同该领域专家交谈并获得认可后，他可以在大学讲一本书了，通常在成为大学的员工之前，他还得通过进一步的正式考试。之后，他可以开课但是没有任何薪水，只能挣学生的课时费，当然，他可以决定讲任何他感兴趣的题目。

在美国，学术职业的起点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最先是当助教。这有点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的情况，在这些地方，通常有极少数助理试着让自己去适应私人讲师的位置，但常常只有更少的人能做到。

实际上，这种对比表明在德国从事学术有一个必备的财富条件。因为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而言，生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没有资金支持是相当困难的。他必须能够坚持足够的岁月，无须关心他是否有机



会能够获得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位。

在美国这个存在官僚体系的国家，年轻学者从一开始就能获得报酬。当然，他的薪水是有限的，大致相当于一个半熟练工人的工资。不过他一开始就有一个相对安稳的职位和一份固定的收入。但是，按规定也得提醒他，就如同提醒德国的助理一样，他并不总是能够满足要求。

这些要求是这样的：美国的年轻学者一定要能够吸引大量学生。这对德国的讲师来说是不会有的事，一旦选了他的课，你就不能赶他走。也就是说选课的人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他会注意到，数年工作后，他有一种道德权利期望某种回报。他同时也期望——这非常重要——当考虑别的私人讲师是否合适的时候，有人会尊重他的意见。

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选后者。但这会增加风险，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尽管具有良知，还是更倾向于自己的弟子。如果说我的个人态度，我会说我遵循这样的原则：我所举荐的学者一定在其他大学的教授看来也是合格的。但结果是我最好的弟子在另一所大学被拒绝了，因为那里的人没谁相信这是合理的。

德国与美国更深层的区别在于，德国的私人讲师总是只能上比他预想少得多的课。根据他形式上的权利而言，它能开他自己领域内的任何课程，但他这样做势必顾及不了老教师。结果，全职教授上大课，而讲师将自己视作是第二批次人员。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年轻人有时间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尽管他想多上课的愿望受到了限制。

美国的安排在原则上与德国不同，准确地说就是在他当助教的时候他绝对是负担过重，因为是给了他薪水的。比如说，德文系的全职教授上三小时课讲歌德也就够了，然而年轻的助教如果只给安排他每周上十二学时，包括德语练习、讲授比如说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他是幸福的。管理人员给助教的课是单独排的，这种待遇就和德国的研究助理是一样的。

往后我们会发现，德国大学在广泛的科学领域都将朝美国体制的方向发展。大的医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所成为“国有”的企业，没有大量的基金就无法运转。我们将会遭遇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同样的条件：“工人同生产资料的脱离”，也就是说，工人即助教是依赖于政府注资医院提供的设备；之后，他对研究所领导的依赖就同工厂里雇员对主管的依赖是一样的。由于下属的依附和忠诚，主任相信研究所就是“他自己的”，他掌管研究所的一切事务。由此助教的位置常常同任何“准无产阶级”的存在一样，也同美国大学里的助教职位一样，是很不稳定的。

在任何重要的方面，德国大学生活都将被美国化，一如整个德国生活一样。我相信这种发展会使这样一些行业消失，在这些行业里，技师拥有自己的工具、自己的资料室，即很大程度上他拥有自己的领域。这种发展完全与过去匠人所遭遇的一致，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随着资本家和官僚制企业的兴起，它们在所有这些领域拥有毋庸置疑的优势。但是这种“精神”与德国大学的历史传统是不同的。无论就外在还是内在而言，这些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的负责人，与旧时代的全职教授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对比也表现在内在的态度上，在这里我先不谈这个问题。古老大学的结构从内到外都变得有些虚幻了。

大学职位专门保留下来什么呢，它又加强了什么因素呢？问题在于无论是私人讲师也好，助教也罢，都要成功上升到全职教授或者研究所领导的位置。这简直有点冒险。当然，这也绝非仅仅是机遇，通常有利于水平高的人。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职业，机遇有这样的作用。我要说的就是，我将自己的成功归于一些偶然事件，在很早的时候我就通过这种规则获得了全职教席，当然，同龄人无疑在这种规则下都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我真的在想这些经历的基础，我敏锐地发现，如果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很多人的命运会因此截然不同。然而，在这套机制下，一些人尽管其能力不济却获得了该职位。

冒险比能力更有效的事实并不罕见，甚至发生于所有人类行为因素中，在学术选择的过程中自然也存在。成员或教育部门存在个性缺陷又要为如此多的平庸者混迹大学的事实负责是很不公正的。平庸者占据主流更是因为人类的合作机制，尤其是几个实体之间的合作。就此而言，是由于举荐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的合作。

相应的是教皇选举，这件事可以追溯到很多世纪以前，它是最重要的可控选举的典型，和学术举荐的本质是一样的。受欢迎的主教才有机会胜出，这种概率大于排名第二或第三的主教。美国总统的竞选也同样如此，只有一流的、最优秀的人才能得到国会的任命。多数情况下排名第二或第三的被提名的人只能参加下一次竞选。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技术社会学的词汇，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去调查集体意愿选举的规则是非常有趣的，但我们在这里就不谈这个问题了。然而，德国大学的学院组织也坚持这些规则，人们对它造成的失误并不吃惊，相反它正确任命的比例很大倒让人感到意外。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

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

没有哪位大学老师愿意人们提及自己的任命，因为几乎没有人觉得那是愉快的经历。然而我要说的是，就我知道大量事情而言，无一例外，人们还是希望纯粹客观公正的理性来做决定。

人们肯定清楚另一件事：以学术为业是一种冒险的活动并不仅仅因为根据集体意愿来任命。每一个被称为学者的年轻人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他面临双重任务：他既要称职的学者也要称职的老师。这两者并不是一点也不冲突，一个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但同时却是一个蹩脚的老师。我得提醒你，像赫姆霍兹和兰克这样杰出的教师，他们绝不是唯一的例外。

现在德国的大学，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大学，正在搞一种最滑稽的招生竞争。大学城的房东老板搞仪式庆祝第一千个学生的到来；如果学生人数突破两千他们就要举火把游行。对费用的兴趣——人们公开承认这一点——受到了“招揽顾客”的周边行业委任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招收学生的数量是一场资格考试，这种资格可以根据数目来理解，然而成为学者的资质却是不可衡量的，即便是胆大的创新者也衡量不了，且易招惹争论——这种资质是天生的。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这样的影响，有人建议说大量招生具有无法估量的好处和价值；人们对讲师说当一个穷教师匠就等于是被宣判了一种学术的死刑，即便他是世上一个很有前途的学者。问一个教师是不是一个好教师，就得看有多少学生崇拜他。

事实上，学生是否聚集在老师周围，它的规模有多大，就算是达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也都是由纯粹外在的事情决定的：性格和声音的影响。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我进行了清醒的反思，我极难信

任那些吸引大众的课程，尽管它们难免也有价值。民主可以用在任何恰当的地方，科学训练，一如我们根据德国大学传统所实践的那样，是精神贵族的事业，我们自己不会隐瞒这一点。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能否完成并不取决于招生的数量。回到我们的主题——这种技艺是每个人的天分，它绝不与学者的科学资格相一致。相比法国而言，德国在科学上还没有什么“永恒的”共同体。根据德国的传统，大学要公正对待研究和指导的需求，个人是否兼具这两种能力纯属偶然。

学术生活是一种疯狂的冒险活动。如果年轻学者向我请教恰当的建议，我几乎不能承担鼓舞他们的责任。当然有人说，如果他是犹太人就要放弃做学者的希望了。但一定要问问其他的人：你真的相信你能容忍平庸之辈年复一年地爬在你头上，而不烦恼和痛苦。人们很自然这样回答：当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然而我发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况而没有痛苦。这就是我认为有必要讲的以学术为业的外部环境。不过我相信你们还想听点别的，也就是说想听听从事科学的内在使命。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内在使命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便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即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事情在内在外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当他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家的时候，个人才能在某个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就。所有与周边领域交叉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职业上所承担的，也是所有社会学家一定有必要承担的工作——都有这样的负担，最好把用得上的问题提给专家，对于这个问题他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是不好

解决的。个人努力必定是不够完美的，只有通过专业化训练，科学工作者才会完全意识到他所取得的成就经得起考验，这种专业化训练也许在他的一生只有一次。今天，一项真正确定的良好成就同时也是一项专业化的成就。

任何缺乏精彩表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不能意识到他的灵魂依靠于能否将这篇手稿的段落作正确连接的人，都会被科学拒之门外。他将不会有人们所谓的科学经历。没有这种被外行讥笑的沉醉；没有这种“融入其中，千年弹指过；隔离其外，静待上千年”的激情——根据你能够成功正确作出连接；没有这些，你就没有从事科学的使命感，你将从事别的职业。因为除非一个人有热情投入其中，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值得成为某种人。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热情，即便内心真诚、知识渊博，也不能使一个问题产生科学结果。当然，热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驱动力”的前提。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科学已经变成了计算问题，和“工厂”一样，是在实验室里编造或统计归类体系。科学这种计算只需要工具理性而不是人的“心灵与灵魂”。首先，人们会说这样的评价对工厂或实验室缺乏了解。如果一个人要完成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他一定会想到这两个方面，这一定是正确的观念。这种直觉是不能强迫的，这与任何冷冰冰的计算是不一样的，诚然计算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前提。比方说，没有哪一个社会学家，即便是上了年纪，会认为自己太善良以致不会在头脑中进行数以万计的细微计算，也许他既善良又同时计算而持续了好几个月。如果一个人想计算点什么，即便最终结果确实很小，如果他想把这个任务完全转交给机械助手，他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如果在他计算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关于计算方向的“理念”，没有任何最终结果的“理念”，那么即便是小的结论

他也得不到。

正常来说，这样的“理念”只有在刻苦工作之后才会有，但也并不总是如此。从科学上讲，一个粗犷的理念也可能同专家的理念一样、甚至会与科学有关。正如赫姆霍兹说罗伯特·迈尔，外行与专家的区别只在于外行缺乏固定的和可靠的工作程序。结果他常常无法在这种立场下去控制、评价或者挖掘其产生的理念。理念不能代替工作；同样，工作也不能替代理念，热情也是如此。热情和工作同时并举才能产生理念。

理念只有在它们自己高兴的时候，而不是让我们高兴的时候才会现身。最精彩的理念，用伊埃灵的话说，是坐在沙发上抽雪茄的时候迸发出来的，依照赫姆霍兹的自然科学的精确勾画，是顺着街道的缓坡散步时，或在类似的情形中，突然想出来的，反正总是在没有期待它的时候降临的，而不是在一个人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搜索枯肠时出现的。

无论如何，科学家必须同不确定性进行交易，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的科学工作中：理念呈现或不呈现？他也许是一个杰出的工人但也有可能终身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理念。如果认为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科学领域，其他领域比如商会、实验室的情况完全不同，你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没有“商业想象力”的大商人或大实业家，也就是说，没有理念或直觉的人，终身当一个店员或者一个技术员对他来讲可能更好。他在组织中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创造力。科学领域内的灵感绝不是学术性的自负幻想，现代企业主导下的实际生活问题也需要灵感，其作用一点也不比科学领域的少。另一方面，人们通常误认为，艺术王国比科学王国更需要灵感。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似乎数学家只需要坐在椅子上，用一把尺子和计算器或者其他计算工具就可以获

得一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维尔斯特拉斯函数的数学想象无论是在意义还是在结果上都与艺术家的想象完全不同，存在本质区别。但两者的心理过程并无不同，都是一种狂热（柏拉图称之为迷狂）和“灵感”。

现在我们会说，我们拥不拥有科学灵感有赖“天意”，仰赖“天赐”。最后然而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因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尤其在年轻人中流行这样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他们为偶像服务，这种偶像崇拜今天占据了大街小巷、各大期刊。这些偶像是“个性”和“个人经历”，这两者紧密相关，人们认为后者依附于前者并属于前者。他们驱使自己去“经历”生活——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个性”，认为这种经历是适合某种“个性”的。如果没有成功“经历”生活，我们最后必须假装拥有了这种体面的礼物。前面我称为“经历”的东西，在普通的德国人那里就是“感觉”的意思；我相信我们对什么是“个性”、它意味着什么，会有充分的认识。

女士们，先生们。在科学领域，只有致力其中进行研究的人才会有“个性”。这也不仅在科学领域，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为自己的工作而做事。就艺术而言，即便拥有歌德的“个性”，如果艺术家想自由地把自己的生活带进艺术品中，这也会对他的作品有害。即使具有歌德那种层次的人格，如果仅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任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后果会不堪设想。若是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就让他至少把自己当作歌德试试看吧。人们至少都会同意，即使像他这种千年一遇的人物，这样的任性也要付出代价。政治事务与此不同，但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在科学领域，一个从事某个领域的人，拾阶而上、在经历中证明自己，不断追问：我何以证明我不仅仅是一个专家，我如何能说出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



上别人都没有说过的话？——这样的人是没有“个性”的。今天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群体现象，它常给人造成微小的印象，降低我们谈及的那个人的地位。相反，对任务的献身精神，会让科学家感到他所从事的主题的崇高和尊贵，这与艺术家没有区别。

科学与艺术具有这些相同的前提，但是它们也存在深刻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科学的命运。科学工作是与进步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艺术领域没有同样意义的进步。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某个时期的艺术采用了新技法，比方说采用了透视法，我们不能说它比不具备这种知识和方法的艺术——如果它的形式符合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它所选择的对象不需要这种条件和手段就能被艺术地掌握——要高。真正完满的艺术品是无法超越的；它也永不过时。人们对艺术品个性意义的品鉴也许不同，但没谁能说这样的艺术品将被同为“完满”的艺术品超越。

在科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所取得的一切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将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这也恰恰是科学研究的意义，人们是在非常专门的意义上从事科研的，这与其他文化领域不同，其他文化领域都是在一般性的意义上从事研究的。任何科学的“完成”都将提出新的“问题”；它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愿意从事科学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当然因为科学的艺术品质，科研工作也会带来“满足”，或者说科研工作作为一种训练方式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科学家将被科学地超越——再重复一遍——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或者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不超越我们，从原则上讲，这种进步没有止境。谈到这里我们就要开始深究科学的意义了。某件事情是否由于服从了这样的规律，它本身便成为有意义和合理的事情，这显然不是不证自明的。